

辞书研究丛书
CISHU YANJIU CONGSHU

辞书论集

(二)

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处 编

CISHU LU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丛书

CITU YANJIU CONGSHU

辞书论集

(二)

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处 编

CISHU LU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S2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书论集. 2/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处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9
(辞书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6-3775-1

I. ①辞… II. ①上… III. ①辞书学—文集 IV. ①H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7553 号

责任编辑 徐祖友
助理编辑 郎晶晶 李潇潇
装帧设计 姜明

辞书研究丛书

辞书论集(二)

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处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46 00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775-1/H·539

定价: 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4322465

前 言

上海市辞书学会已成立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国辞书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在我国 5000 年的文明史上可谓“前无古人”,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和数字化时代对中国辞书人提出的挑战也极为严峻。上海市辞书学会立足于上海辞书编纂和出版的实际,近几年对此进行了多次研讨,特别是在学会组织的“中青年辞书沙龙”中,上海青年辞书工作者充分发挥其职业热情和职业敏感,提交了不少富有创见的文章。本书即以此为主体,另收录了鲍克怡、徐庆凯、邓伟志等学会老领导、老专家的数篇文章。为体现与本学会编选、知识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辞书论集》的连续性,名之为《辞书论集(二)》。

编者

2012 年 6 月

目 录

- 鲍克怡 制止辞书质量滑坡 努力提高辞书质量 / 1
- 徐庆凯 辞书的文化价值 / 10
- 邓伟志 回忆年鉴的初创 / 18
- 徐时仪 略论汉语语文辞书的修订 / 22
- 徐文堪 关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的编纂 / 51
- 夏 军 试析《说文》表名词会意字的取象—表词模式 / 58
- 郎晶晶 评许少峰《近代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
——以释义为例 / 70
- 李丽静 关于敬谦辞辞典编纂的一些想法
——兼评《谦词敬词婉词词典》 / 78
- 宋浚瑞 小议《汉语大词典》修订中的例证选择问题 / 90
- 傅玉芳 成套词收词的完整性与释义的一致性
——写在《汉语大词典》修订之前 / 99
- 钱厚生 双语词典出版工作思考 / 106
- 王馥芳 认知语义学对词典经典意义观的挑战 / 110
- 万江波 双语词典文化负载词目翻译的补偿策略 / 122
- 闻人菁菁 双解词典例句翻译等值的实现 / 135
- 孙东云 基于网络语料的在线双语词典初探 / 143

- 李潇潇 认知词典学视角下外向型学习词典中观结构的考察与思考
——基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七版纸质版与第八版光盘版的比较研究 / 156
- 徐 玲 一部岁月熔铸的盛世经典
——评《汉英大词典》(第3版) / 167
- 李 皓 浅议日汉词典中文化局限词的处理方式 / 174
- 高永伟 鲍康宁和他的《汉英分解字典》 / 180
- 张 敏 辞书编纂中反映地名信息变化要注意联动性 / 193
- 沈 岩 论专科辞典的定位与风险管理 / 202
- 张玉霞 基于受众需求的专科词典的编撰与营销 / 207
- 苏轼颖 辞书编纂中如何做好政治性问题的技术处理 / 215
- 刘诗发 专科辞典选题策划中的几点感想 / 223
- 胡全红 浅谈专科词典的应用性 / 229
- 李 黎 参见系统的专项检查
——以《辞海》(第六版)科技条目为例 / 234
- 乐嘉民 辞书的数字出版 / 243
- 张国强 Web2.0 与数字化工具书
——兼评“百度百科” / 249
- 王慧敏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五版的全媒体出版及其启示 / 261
- 汪 溪 浅谈辞书的装帧设计 / 277
- 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处 上海市辞书学会年度大事记 / 289

制止辞书质量滑坡 努力提高辞书质量*

鲍克怡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6年10月,文化凋零枯萎的梦魇般的十年终于结束了。之后,国家各个方面渐渐开始复苏,文化事业亦然。《现代汉语词典》(下文简称《现汉》)、《辞海》、《辞源》等几部词典的编纂在原有基础上重又加紧进行。1979年以后的数年,辞书事业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不仅原有的《现汉》、《辞海》、《辞源》相继修订出版,而且其他词典也日益增多。在此期间,辞书事业有两方面的动态很值得注意:其一,各学科的专科词典品种逐渐增多,改变了辞书长期来以语文词典为主的局面,形成语文词典、专科词典双轨发展的局面;其二,对辞书编纂的理论开始进行探索并逐渐深入,取得可喜的成绩,改变了辞书只有编纂实践而无理论研究和指导的状况。分别创刊于1979年和1980年的《辞书研究》及《词典研究丛刊》,对推动辞书理论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1982年,上海辞书学会成立,更进一步促进辞书理论的研究以及辞书编纂的实践。

80年代初期,据《辞书研究》发表的统计材料,汉语语文词典,每年新版二三十种,后逐渐增加到每年新版五六十种;双语词典、专科词典、百科词典、年鉴等多品种全面发展,可谓进入了辞书的繁荣时期。在繁

* 本文作者为原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辑、原上海市辞书学会会长。

花开放的同时,芜杂之状也渐显露。80年代中后期,每年新版的辞书种数已很难准确统计,其中精品有而不多,平庸的甚众,劣品赝货也不少,用“多而滥”三字形容,并不为过,辞书质量总体的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使用者对这种现象不满,有责任心的编者和出版社急呼要提高辞书质量,然而,质量下滑的事实至今还在继续,“劣质产品”还在出笼,读者还在被坑害。辞书学会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应对这种不健康状况予以揭露和批评,为提高辞书质量,为辞书不愧承当“典”之名称而努力。在这方面,上海辞书学会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在此,就辞书质量滑坡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质量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辞书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1) 先循质量下降的时间轨迹探寻。“文革”刚结束时,全社会一片欢腾,文化界也因终于盼到告别“文化沙漠”的日子而欣喜万分,写作趋于活跃,辞书也开始踏上发展正途。由于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基本工具书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一些经受时间检验的优秀辞书如《新华字典》、《现汉》、《辞源》、《辞海》等,发行量都很大,《新华字典》许多省市租型印刷,单上海一地已印刷24次;《现汉》至今已印刷115次。发行量就意味着“赚钱”,上述几部辞书也确实各出版机构的利润支柱。但是,编纂这几部辞书的初衷,恐怕“钱”字决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现汉》、《辞海》、《辞源》三书,国家对之有明确要求,参与其事的人,无论是编纂者还是出版者,都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心,都为完成“事业”而忠实、努力地工作。唯其无“求钱”之心,而有“立业”之意,才有一版再版、经得起使用者检验的上乘质量。然而,不少人没有看到优秀辞书编纂的艰辛,而只看到大发行量,他们发现这里原来还有一条“生财之道”,于是,辞书发展的正途之外出现了岔路,一些人把辞书当作摇钱树,忽然热衷起编辞书来。由此,可以总结出辞书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编写者和出版者趋向一个“利”字,钱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至于辞书应

该是“给人以某种知识的标准答案”的原则，在这些人的头脑里被大大忽视了。这种行为可以称之为“见利忘义”。

(2) 辞书是书籍中一个特殊的门类，它有不同于其他书籍的特殊规律和表现形式，从正文前的“凡例”到书末的“索引”，是一个“系统工程”，作者和编辑没有专门训练，难以入门，所以内行称辞书编纂“另有一功”。目前全国 500 余家出版机构，除却专业出版辞书的几家以外，不下半数每年都有新词典问世。其中固然有掌握规律、富于编纂经验的作者和编辑认真工作而生产出的质量优良的作品，但也有不少是质量不佳的。对于词典的出版，国家出版领导机关曾多次指出，出版社要有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中级和高级技术职务者，要有严格的三审制度，才能从事词典出版业务。然而这一指示未能认真得到贯彻，为数不少的词典出自对这一特殊品种的规律和要求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者之手；并且，由于许多作者和编辑并非专门从事辞书这一事业，在出版一本词典之后，无暇对其优劣回顾总结，因而当下次再编词典时，质量也仍然难以提高。

(3) 一部辞书质量的好坏，编纂者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部高质量辞书的作者，对本专业知识的掌握要达到相当深度，要了解本专业的重要研究动态，特别要了解新的学术观点，对多种学说要具有鉴别力；除此之外，对丰富的专业知识要有高度的驾驭能力，能用准确、精练、清晰的文字把丰富的内容归纳压缩于以词条形式出现的特殊框架之内。由此可见，词典中一个几百字的条目，非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难以胜任。曾有人认为编写词典是“述而不作”，这一观点如指的是词典编写者不在词条中主观加入一己看法，则此说尚可；如认为编写者只须摘抄他人成说，毫无己见，则完全是误解。但是，目前有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对辞书编纂成果，在技术职务评定中不予承认或不予重视，这说明整个学术界对辞书编纂的难度所知不多，也说明评定技术职务政策的制订还有不够完善之处。《辞海》(未定稿)的作者，不乏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一流专家、知名学

者,其后历次修订,接踵前辈的也都是各专业中学有所长的中老年专家;其他著名辞书,编纂者也都如此。然而,社会的不予重视和政策的未尽合理,打击了一部分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编著辞书的积极性,也使一些不学无术者藉辞书编写力量不足,乘虚而入,这也是辞书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4) 一部高质量的辞书,以中型的为例,从着手计划到出版面世,费时四五年是不慢的速度。《辞海》(未定稿)1959年开始编纂,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一大批专家学者当时能以全部身心时间投入工作,不少人日以继夜潜心于字斟句酌之中,孜孜不倦。至1965年“未定稿”出版,历时6年。就一部1100多万字的大型词典来说,这是很快的速度。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哲学大辞典》自1981年始编,1992年出版,历时12年。《汉语大词典》自1975年始编,计划于1995年出齐,前后20年。以毕生精力献身于辞书事业的学者,国内外都不乏其人,他们把编纂一部高质量的辞书,看作对文化、对人类的贡献,这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思想境界。然而,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学者花长久时间于辞书编纂,在学术上的成名与经济上的所得,均不及写其他专著,这也促使部分确能胜任辞书编纂任务的人士不愿从事这一工作。一流编纂者的减少,也是辞书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5) 对已出版的辞书,缺乏科学的、权威的评论,也是辞书质量不能提高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家级的辞书评奖尚未建立,现有的一些评奖,虽有一些促进质量的作用,但总的来说,积极作用有限,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查手段,因此,出现获奖书籍质量不高、高质量的未能获奖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

二、辞书质量下降的主要表现

(1) 辞书既被一些人看作“述而不作”,显示不出作者的学术水平,同时又被人称为“经典”,世界各国著名辞书的主编和编纂者都被称为

一流的学者。这两种矛盾的看法,实际正说明要认真编出一部有益于世人的辞书,没有很深的学术造诣是做不到的。辞书有其自身的特殊要求,大概而言,编纂者首先要确定欲编的辞书的性质(例如大型、中型、小型,详解型、简释型,要给使用者以何种水平的知识等),由此而步步深入地确定立目原则、释义要求、资料收集范围、全书体例规定、编排方法、采用何种索引等。在立目方面,就有收词范围、收词层次、词目平衡等问题;在释义方面,就有如何下定义、相互关联的条目解释的一致性、辞典体特殊语言的掌握等;在体例方面,从全书格式的总体设计到许多细小的形式规定,自始至终都须研究。严格地说,任何工具书在编写之先,都须作如上许多方面的考虑,可是现在从事辞书编纂的人员,能熟知其特殊规律的实在很少,粗知门径者,也为数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辞书收词无原则,拿到篮里就是菜;解释无定规,根本不知何为辞典语言;相关条目各说各辞,互相矛盾;全书无统一体例,杂乱无序的原因。有些专家学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在撰写辞书条目时,由于未掌握辞书编写规律,并不能得心应手,更何况有些人既无专业知识,也不知词典如何编写,而竟编起为人“无声之师”的词典来,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2) 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东剽西窃,拼凑“新作”。著作界的抄袭之风,在辞书领域中最盛,这一判断大概不误。由于词条是每条独立的,从几本辞书中拼拼凑凑,确也能“编”出一本“词典”来。这种做法既欺骗读者,也侵犯被抄袭者的利益。《现汉》、《辞海》、《辞源》等大型辞书被抄袭的现象更是严重。上海辞书出版社近几年来为保护著作权,不得不几次对抄袭侵权者提起诉讼。抄袭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但直至今日,辞书的抄袭现象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以致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仍在继续发生。

(3) 不求自出新意,蹈袭他人成辙,也是辞书界近几年来明显的不良现象。最为典型的是“鉴赏”类辞书的泛滥成灾。1983年,《唐诗鉴赏

辞典》(以下简称《唐诗》)作为辞书编纂的一种新尝试,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由于它的独特编辑构思,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于是引起趋利者争先恐后的跟随,数年之间,各种鉴赏辞典铺天盖地而来,不少“袭作”一应体例照搬《唐诗》,甚至前面放几幅彩色插页、中间夹几帧线条白描,末尾收几种附录,乃至封面的总体格局,都悉遵鼻祖,既可赞之为“忠实遵守”,更可斥之为“不思长进”,辞书出版的堕落之风,此是一个明证。此外,受到社会承认的某些名牌词典的专门书名如《辞源》、《辞海》等,被很多书使用,《学生辞源》、《学生辞海》等,有的见之于广告,有的已经出版。虽然书名不像商标那样有法律加以保护,但特殊书名的设计也是智力劳动成果,怎可随便袭用而心安理得呢!袭用者也无非借畅销书之名牟利而已。1936年出版的《辞海》,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先它20年出版的《辞源》,为了显出特色,从内容到书名都做了革新。旧社会中竞争者尚且立足于以自身的创造同对手较量,而今天的出版界中有一些人似乎专在寻觅他人的成名之作,紧跟而上,“拿来”我用,自己的思维已经枯竭。这种行为现未受到任何指责,这对辞书事业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4) 与剽窃他书内容、蹈袭他人旧辙的做法相联系的,是一味求快,抢占市场,先捞一票的手法。编纂辞书是一件费工夫的事,能早一点向社会奉献好的成品固然是好事,但是,对辞书而言,做到又快又好殊为不易,因为整个过程中从总体到细节,环节太多,有一点疏忽就会产生错误。求快,更须求质,二者不能得兼时还应以保质为第一原则。至于一年左右完成一部中型词典,十多年间词典等身之类,我觉得是神话。(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事实。)当认真的作者还在埋头于寻索资料,努力求得优质之时,他人“短平快”地就把书“编”出来了,有时甚至连书名也一并“引进”,使先着手而后出书者反成了袭用书名的“小人”,这种捷足先登的做法,其质量怎么能有保证呢?

(5) 同类型辞书重复出版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词典内容相同或相

近,你抄我一点,我抄他一点,了无新意。最突出的有成语类词典、名句引语类词典、鉴赏类词典、作文类词典、学生词语类词典等,这些种类近十年内各有多少,恐怕谁也统计不清。同品种的词典中也确有以严谨态度编纂的,但为数不多,多数质量平平或欠佳。由于同类书太多,购买者在书海中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才好。

三、提高辞书质量的可行方法

提高辞书质量,不仅是辞书界应当努力去做的事,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事,因为只要不是文盲,大多数人一生中都要向辞书请教。但提高辞书质量,又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我觉得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是目前可行的方法:

(1) 加强辞书编纂理论的研究,以理论指导实践,再从实践中总结理论。自80年代初至今的十余年中,我国辞书编纂理论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研究语文辞书编纂到研究专科辞书、百科全书、年鉴等的编纂,可以说,在辞书理论的研究方面,我国决不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国外,例如英、法、俄、美、日等,都有知名于世的大型辞书,但在现代辞书理论的研究方面,我们早已跨出了使辞书学不再附属于语言学的步子,我们的研究面相当开阔。当前,应当充分发挥各地辞书学会的作用,发挥专业期刊的作用,使理论研究的成果真正对辞书编纂有指导意义。应该指出,目前理论的研究同编纂的实践有一定脱节,实际编纂辞书的人有相当数量对理论不感兴趣,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2) 对作者和编辑两支队伍加强训练,以提高辞书质量。前面已经谈到辞书不同于其他书籍,它有自己的特殊要求。作者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部辞书质量的根本基础;出版社编辑的审稿修改,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编辑审改水平的高下,对辞书面貌的影响也很大。一些专业辞书编辑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同作者很好地配合,能弥补作者在了解辞书特殊规律不足方面的缺陷,刮垢磨光,使成品更显光

彩。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编辑,常应作者之邀,在编纂工作开始之前先给作者讲解辞书的特殊要求,使编纂工作从一起步就能循正轨进行,这就说明队伍培养的重要性。提高作者和编辑的水平是保证辞书质量的最根本办法。

(3) 吸收国外现代辞书的科学编纂方法,使我国辞书编纂在现有基础上跨出新的步伐。我国的辞书历史可以上溯到 2 000 年前,但发展到今天,还基本上没有脱离前人的窠臼,近十多年,理论研究虽有进展,但在实践的改变方面并不明显,辞书的总体面貌同数十年前没有多大差别。而国外的辞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在起着变化,有些出版已经一二百年的大型辞书,在再版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能符合现代社会人们求知的需要。如 1974 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15 版,从内容到形式到编排体系都做了革新,是百科辞书编纂史上的“一次革命”。这种大胆而又严谨、科学的求新精神,值得我国的辞书界学习。我国的辞书有优良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吸收国外辞书的现代理论和方法,一定能使我国的辞书编纂达到更高的水平。

(4) 加强理论指导下的严格的辞书评论,公正地、科学地评选优秀作品,同时也批评粗劣低下的品种,在辞书评论领域中树立良好的风气,这也是提高辞书质量的重要方面。目前各种书籍评奖甚多,辞书也参与其中,获奖辞书,有的确是好书,有的却并不真好,甚至有些抄袭之作也在获奖之列。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科学的、严格的衡量标准,评审一部辞书的质量,究竟应从哪几方面着眼,恐怕参加选评者也不一定尽知其详;此外,评奖的风气也不是毫无可指责之处,照顾关系、各方摆平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辞书既是一种特殊的书籍,可以单独评审,由广大读者和权威而公正的专家认真评选,每年评出几部真正高水准的辞书,以为典范,同时对不负责的编者和出版单位严厉批评,使辞书符合“典”的身份,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使用者。

(5) 运用法律手段促进辞书质量的提高。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不得

抄袭他人作品公开发表,辞书是各类书籍中抄袭现象最为严重的。每一个辞书编纂者以及每一家出版社,都应该注意保护自己的著作权不受他人侵犯,同时也不应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在目前抄袭之风很盛的情况下,被抄袭者就应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侵权行为做斗争。只有造成“抄袭行为人人喊打”的声势,才能使这种不良行为降到最低程度,辞书的滥出版也才能得到抑制。

辞书的质量关系到它给人们知识的正误,编写者和出版者都要向使用者负责,向社会负责。制止质量滑坡并努力提高辞书质量已是当务之急,每一个辞书工作者都应该正视这一问题。

(原载于《辞书研究》1992年第5期)

辞书的文化价值

徐庆凯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期战略目标。这对我们辞书工作者来说,是巨大的鼓舞、有力的鞭策。在我国,合格的辞书,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工具。所以,根据六中全会的要求,我们应该有更强的自觉性和责任心,编纂更多更好至少是合格的、最好是优秀的辞书,来回报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为此,我想就辞书的文化价值问题讲一些粗浅的认识,与辞书界的同仁交流。

本文讨论辞书的文化价值,是就辞书的总体而言的。就辞书的个体而言,其文化价值的高低差别极大,不能一概而论。我国现代的标志性辞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文化价值很高。还有一批获得国家图书奖的辞书,以及虽未获奖但质量优良的辞书,文化价值也很高。但是另有许多平庸的、粗糙的辞书,文化价值就不高甚至很低了。尤其是从20世纪末开始泛滥起来的伪劣辞书,非但没有丝毫文化价值,而且恰恰是败坏文化的精神垃圾。因此,对辞书个体的文化价值要区别对象做具体分析,而对辞书总体的文化价值,则主要是就其中较好的辞书而言的。

从总体上说,辞书的文化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反映社会的文化水平 显示国家的文化实力

早在1915年《辞源》出版时,其主编陆尔奎就在开头的《辞源说略》中指出:“一国之辞书,常与其文化相比例。”又说:“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1917年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辞典》所写的序中也说:“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与多寡而知之。”可见,在将近一百年前,学界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对辞书的文化价值做出了精辟的评论。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论断。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79)从辞书的质量着眼,指出:“工具书的质量,是一国文化水平和科学研究成就最明显的体现。”这话说得十分中肯。看辞书的文化价值,不但要着眼于数量,更要着眼于质量。辞书出得既多又好,它的文化价值才大。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如果没有《辞源》和《辞海》,如果没有《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如果没有其他许多高质量的辞书,我国的文化形象将会如何?不是说现有的文化水平和文化实力将不存在,而是说它们将无法集中地展现出来,将难以像现在这样比较充分地发挥其作用。所以,编纂优质辞书,是国家的重点文化工程之一。辞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这项工程建设好。

二、荟萃本国文化精华 积累人类精神财富

与发表见解、论证观点、讨论问题、抒发感情的普通著作不同,每一部辞书应有的任务,都是按照其本身的性质和规模,在自己涉及的知识领域内,把古往今来已有的认识成果加以收集、分析、研究、考核、比较、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条目这种浓缩的形式,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加以提炼、概括,从而把宝贵的精神财富保存下来,积累起来,传播开来。严肃认真的辞书编纂者为此付出的长期的、艰巨的劳动,就凝结成为一部部优质辞书。有一位学者曾形象地说:“辞书工作者的神圣职